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邱涛
编

宋恕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邱涛
编

宋恕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宋恕卷/邱涛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2
ISBN 978-7-300-18715-0

I. ①中… II. ①邱…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②宋恕 (1862~1910)-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8760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宋恕卷

邱涛编

Songshu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36.75 插页 2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82 000

定 价 8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1840年到1949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 1840 年至 1949 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疵，敬请方家指正。

导 言

宋恕（1862—1910），浙江温州平阳县人，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原名存礼，字燕生，后改名为恕，字平子，号六斋，晚年复改名衡。

宋恕出身于平阳一个士绅家庭，其家世代业儒。宋恕自幼聪颖，诵读诗书，过目成诵，幼年时被称为神童。八岁入塾发蒙，九岁即能为古今体文，谈论经史，常与宋元学者立异，颇有独到之见。十四岁，读《王阳明遗书》而深喜其“虽言出孔子，未敢以为是”之说，年十六为县诸生。^①旋受知于侍读学士孙锵鸣，深得锵鸣赏识，及长，招为婿。自此，宋恕师事晚清著名学者孙衣言、孙锵鸣兄弟，学问大有进益，并能近水楼台，得常从孙衣言之子、经学大师孙诒让问学，得天独厚的问学优势，使宋恕的学识更上层楼。

宋恕青少年时期，与乐清陈虬、瑞安陈介石结为莫逆之交，时相往还，畅游山水之间，吟诗作文，时人称之为“浙东三杰”。他还常与组织了求志社的布衣学者金晦、陈虬等切磋学问、讨论时务。^②对学问的孜孜以求，艺学之有所承，使宋恕既有乾嘉学派的学术根柢，又很早就接受了宋代永嘉学派经世致用之学、明清之际产生的早期启蒙思潮，并不断接触到鸦片战争以来面对西学东渐而出现的社会改革思想，以及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使他立志改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

宋恕二十五岁时，父亲宋宾家去世，弟宋存法争产夺权，家难迅即爆发。其恶弟宋存法在家族中专横、霸蛮，然在社会交际中，却表

^① 《平阳县志》卷三十九，“人物志八”。

^② 陈谥：《陈蜚庐先生传》，载《瓯风杂志》，1934年第11期。

现出豪爽、懂礼之态，以致不了解宋恕家庭状况的当地官绅，对宋存法的认识、观感并不坏，而多不信宋恕的申诉，以致宋恕被迫离家远避后，仍无法惩治恶弟，甚至无法保护母亲和其他诸弟。在反抗恶弟迫害的痛苦历程中，宋恕认识到：“士大夫之品评无据，远不如种田挑担人之有真是非。”

宋恕被迫离家后，常居于浙江温州瑞安，经济状况颇为窘迫，生活困苦，使他在实际生活中和心理上都能接近社会下层民众，能够了解并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处境，加上他接受佛学的慈悲之说，故产生了“著书专代世界苦人立言”的思想和行动。

1887—1888年，宋恕随岳父孙锵鸣游历上海、南京，分别在上海龙门书院、南京钟山书院任教，后又到杭州。上海租界繁华的十里洋场，仍残留着太平天国战争破坏痕迹的江南城乡，刚刚过去的中法战争战胜求和的屈辱，处处给予宋恕强烈的刺激和震动，使他立下“欲扫西庭壮本朝”的志向，他开始走出传统儒学的藩篱，如饥似渴地学习西学，研究佛学，希望能找到解救中国社会危机、振兴中华的道路。^①

1890年，宋恕在他的老师、著名学者俞樾的介绍下，前往湖北武昌谒见湖广总督张之洞，申说变法维新主张，遭到冷遇，由此对张之洞颇有陈见，对其作为多有揭露。此后一段时间，宋恕游历湖北、南京、上海、山东等地，遍交海内名士，博览各种典籍和近译欧美著述，渐成一家之学。

1891年，宋恕移住瑞安，开始酝酿《六字课斋卑议》（简称《六斋卑议》）的写作。1892年4月，宋恕完成《六斋卑议》初稿。宋恕在此稿中提出“学校、议院、报馆”是国家富强的三大纲领，并强调指出“白种之国，独俄罗斯无议院，故俄最不治。黄种之国，独日本有议院，故日本最治”，主张中国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六斋卑议》提出，中国要发展经济，政府得准民间集股开矿，改革货币，修建道路，严禁田赋浮勒，以振兴农业；裁撤厘金局，以振兴商业；劝集商股购买机器，以发展工业。他指出守旧者认西洋机器为“奇技淫巧”之谬，实际上“机器之学绝于愚民之世”，是科学文化发达的标志。宋恕还主张效法西欧国家，办工业、农业、商业学校，造就专门人才。他还认为汉字难学，提出汉语拼音的主张，即学习日本，制造出

^① 《平阳县志》卷三十九，“人物志八”。

一种切音文字作为辅助。宋恕在汲取东西各国自强之道的经验基础上还提出,日本和西方强国之所以日强,在于它们允许“官民男女立会讲学”,其学会名称有天、地、哲、史、文、律、农、工、商、医等种类繁多,“学会最多者,其国最治;次多者,国次治;最少者,国最不治;无学会者,国不可问矣”。因此,他提出中国应创立各种学会,要求清政府“播告天下:许官民男女创立各种学会”,“学会兴,则君子道必日长,小人道必日消,而山泽盗匪之会自将解散于无形矣”。

针对程朱理学成为社会伦理行为规范,造成中国社会男尊女卑的纲常名教和种种惨剧,宋恕在《六斋卑议》专列《伦始章》、《救惨章》,反对重男轻女、包办婚姻:“善男娶恶女,善女嫁恶男,终身受累,而女尤苦;即同为善类,而性情歧别,相处也不乐。”因此,他主张改革父母包办的婚姻制度,结婚除由亲生父母作主外,还需男女双方“亲填愿结”,实行自主,而且男女双方都应有离婚的自由权利,单是男人有离婚自由是不合理的,妇女在婚姻不合的情况下,也应有“去夫”的自由。宋恕对中国的童养媳和买卖婢妾深恶痛绝,他对童养媳、婢、娼牛马不如的生活深寄同情,称她们是“赤县极苦之民”,主张禁止童养媳,严惩逼良为娼的“莠男女”,严禁买婢,禁止缠足,“以救恒沙之惨”。

此稿成后,读过《六斋卑议(初稿)》的知名人士有赵诒琰、张士珩、李鸿章、俞樾、张謇、杨晨、王修植、黄绍箕、王万怀、王韬、张焕纶、梁启超、谭嗣同、章炳麟等人。俞樾、周观和王修植为其写《书后》,谭嗣同誉为“后王师”,梁启超将其列入《西学书目表》,但也有不少人认为此作“惊世骇俗”。

1892年,宋恕赴天津晋见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作为晋谒之礼,宋恕起草《上李中堂书》,并将自己撰写的重要论著《六斋卑议(初稿)》作为附件呈交李鸿章,提出以“三始说”为基础的维新变法政治纲领,希望李鸿章能“建大议,挽大局,除周后之弊,反秦前之治,塞东邻之笑,御西土之侮”,未能得到李鸿章的回应。虽然李鸿章没有令宋恕实现自己的改革主张,对宋恕也未加重用,但仍委任宋恕为天津水师学堂汉文教习委员,这已使宋恕对李鸿章心存感激。此后的议论,宋恕多厚李(鸿章)薄张(之洞)。

宋恕在担任天津水师学堂汉文教习委员期间,开始博览诸子百家,频有所悟、所得,遂从1894年12月开始撰写《六字课斋津谈》,并于1895年2月完稿。这是一部打通上下古今中外,出入经史子集的学术

论纲，贯穿着与封建正统思想斗争的批判精神，充满着启蒙创见，抨击传统旧文化，揭露秦汉礼法和程朱理学的本质，论证变法维新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六字课斋津谈》这本论著的写就，标志着宋恕从古文经学出发的托古改制思想体系的确立。宋恕在酝酿和写作《六字课斋津谈》的过程中，先后就该书与“汉后议论大忤”的核心思想，即“申《周学》、《孔问》之旨”，与张士珩（楚宝）、吕朝周（定子）、贵林（翰香）、钟天纬（鹤笙）、王修植（浣生）、杨晨（定夫）、张焕纶（经甫）、夏曾佑（穗卿）、宗源瀚（湘文）、王咏霓（子裳）、赵诒琚（颂南）、康有为（长素）、傅兰雅（兰雅）、花之安（之安）、李提摩太（李提）、陈黻宸（介石）、陈国桢（容舫）、陈虬（志三）、陈明（宗易）、金晦（遯斋）、黄绍第（叔镛）、王景羲（子祥）、苏梦龙（云卿）、孙诒钧（伯陶）、林庆衍（祈生）、孙诒泽（仲恺）等人交流思想，申述己见。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号称世界第七、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中国在朝鲜和东北节节败退，屈辱求和，似乎证实了宋恕关于不变法图强的老朽中国难以战胜新兴的日本的一贯看法。然而，李鸿章的失势，也使宋恕难以在天津立足，他离津居沪，仍不时为李鸿章辩护。1895年，宋恕前往上海，协助其岳父孙锵鸣襄阅求志书院课卷，并任教于求志书院。在致姻亲、友好的信函中，宋恕斥责翁同龢等清流人士及其不明国情的主战议论，并极力为李鸿章辩护，使他在盛极一时的帝党一流流派的舆论中，很快陷于孤立，但也使他在反清流的人士中找到许多共鸣的契友。

《马关条约》的签订，使爱国志士义愤填膺，改革的呼声响应日众。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变法维新的暗流涌动，日趋高涨。卷入变法运动的维新派人士，尽管按照地域、出身条件、经学渊源和思想倾向等情况，而出现种种差异，但维新人士主要还是按照各自的依靠对象而错综复杂地聚集在一起，主要有这样几大轴心：一是以翁同龢等为依靠对象，如有张謇、康有为、梁启超、张荫桓、文廷式、谭嗣同、唐才常等；一是以张之洞等为依靠对象，如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黄绍箕、汪康年等人；一是以李鸿章、王文韶等为依靠对象的，如严复、王修植、孙宝瑄、钟天纬、张焕纶、章炳麟、宋恕等。由此而产生了甲午戊戌时期不同改革路径的并存。

宋恕自许为中国的马丁·路德，要托孔子之古进行变法维新。他在给王修植的信札中主张“力攻大魔以明佛道”，“聚徒讲励以鼓仁勇”，

“联名通禀以尽己责”，“要求京外大臣力请奏恩变法”。随着李鸿章被闲置、置身朝局之外，王文韶暗中支持而不愿出面，宋恕侧居的这一派得不到有力大臣的支持，因此，他们在戊戌变法运动中没有成为主力，并与依靠翁同龢、张之洞的维新群体存在分歧。康有为在上海举办强学会，宋恕因康有为组织强学会是以张之洞、黄体芳这些清流出身的官僚为首，怀疑康有为继承清流衣钵，故深为不屑，加之宋恕主张以古文经学出发来托古改制，而不满康有为从今文经学出发，以遍伪群经的武断方式来奠定自己的变法理论基础，故拒绝加入上海强学会。而属于江浙维新派的章炳麟，无论在理念、学术流派还是组织系统上，同样与康有为一派产生严重对立，以致被排挤出《时务报》馆。不久，宋恕与章炳麟同编《经世报》，与《时务报》相抗衡，反映出维新派内部出现的严重分歧和裂痕。宋恕当时的理论锋芒集中于抨击叔孙通、董仲舒、韩愈和程颐等人的阳儒阴法思想，在讲学活动中，宋恕则极力宣扬中国自古的爱国、民主的固有传统和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并在新的理论高度上改写并于1897年6月交印出版了《六斋卑议》（12月由上海千顷堂活字排印成书），主张向日本学习，全面论述中央官制和财政经济各方面的变革，人道主义思想大为激昂，提出解放妇女的主张，特别是删去“礼拜孔子”，要求仿效西国“君臣相接”的古礼，提出符合新形势的变法维新方案，为戊戌变法的迅猛发展，起到重要的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宋恕在变革中国的政治社会制度和学术上的真知灼见，曾经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周围的诸多学者。他的《六斋卑议》印本印行后，曾陆续赠给蔡元培、章钊、陈葆善以及沪杭名流、求是书院和养正书院学生许寿裳、黄群、马叙伦等多人，在社会上曾产生较大影响。

宋恕观察到当时变革进程中新兴的变革力量没有形成强大的合力，力量仍显薄弱，没有重臣的大力支持，变法必将夭折。当谭嗣同被荐举、征召入京任军机章京，与宋恕晤谈时，宋恕力劝谭嗣同不要北上，以免其祸。他与康有为无论在学术源流还是变革路径上均存重大分歧，但当康有为以旗手的姿态领导维新运动时，他便放弃经学流派上的门户之见，真诚地拥护康有为发起的维新变法，赞扬康有为、梁启超有“转移天下之人心风俗”的大功。当百日维新失败，六君子遇难后，宋恕悲痛万分，他对政变中遇难的六君子深表悼念，赋成《哭六烈士》诗，高度赞扬谭嗣同等人的英雄壮举。其中《哭谭嗣同》云：

悲哉秋气怨扬尘，命绝荆南第一人！^①空见文章嗣同甫^②，长留名字配灵均。英魂岂忍^③忘天下，壮士终期得海滨。遗恨沅湘^④流不尽，何年兰芷荐芳春？

《哭杨锐、刘光第、林旭》云：

悲风^⑤夜动钓龙台，三峡猿啼蜀客哀。独秀才华惊死去，双忠魂魄忍归来！^⑥涛飞闽海怒难泄^⑦，云暗^⑧岷山惨不开。最痛贾生年弱冠^⑨，一旬参政骨横苔！

《哭杨深秀》云：

三晋人荒二百年^⑩，谁将肝胆壮山川^⑪？十旬京邑^⑫避驄马，一夕津桥泣杜鹃^⑬。徒抱精诚填北海，更无匡复起南天。家风燕市椒山血^⑭，万古长留气浩然！

《哭康广仁》云：

《春秋》师说久荒芜，岭表于今出巨儒。兄弟承恩宣室席，君臣同难素王书。^⑮无衣孰为孤忠赋？此骨难求大侠储。^⑯不反兵仇何日复？

① 原注：“嗣同，楚人。”谭嗣同为湖南浏阳人，为戊戌变法时参与新政军机四卿，“戊戌六君子”之一。

② 原注：“嗣同夙慕宋陈同甫，故自名嗣同。”

③ “岂忍”，孙宝瑄《忘山庐日记》（272～27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录作“何日”。

④ “沅湘”，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录作“沅江”。

⑤ “悲风”，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录作“秋风”。

⑥ 原注：“锐、光第，皆蜀人。”杨锐为四川绵竹人，刘光第为四川富顺人，二人均为戊戌变法时参与新政军机四卿，“戊戌六君子”之一。

⑦ “难泄”，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录作“难尽”。

⑧ “云暗”，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录作“尘暗”。

⑨ 原注：“六烈士中旭年最少，止二十三。”林旭为福建侯官人，为戊戌变法时参与新政军机四卿之一，“戊戌六君子”之一。

⑩ 原注：“深秀，晋人。”杨深秀为山西闻喜人，“戊戌六君子”之一。

⑪ 上七字，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录作“欲凭壮志挽山川”。

⑫ “十旬京邑”，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录作“十年京国”。

⑬ “泣杜鹃”，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录作“啼杜鹃”。

⑭ 明杨继盛劾严嵩，系狱三年，弃西市，临刑赋诗，天下传诵。

⑮ 原注：“乃兄长素著《孔子改制考》，申两汉《春秋》师说，为京外贪虐大臣所切齿，上章请燬其书者以十计，天子不稍为动，反深嘉其通经，日夜与谋改制，卒至君臣同难。”

⑯ 原注：“广仁死，京中交游虽多，然大狱方兴，莫敢收葬，官命投之大窖。”按康广仁名有溥，以字行。

扶桑西望痛奚如!^①

宋恕对专制暴政甚为厌恶,对人民疾苦深表同情,对政治和社会改革极为支持,在戊戌维新时期,他积极投身改革潮流中。不过宋恕总体是言多于行之人,故戊戌变法失败对他的直接影响不大。变法失败后,宋恕也在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如他在《寄怀梁卓如》诗中所言:“自古救民须用武,岂闻琴瑟化豺狼!”他对戊戌政变后沉闷的社会现实多有揭露,如他在《束发篇·答章太炎诗》中所言:“驱车且四顾,猛虎纷当路。妇哭一何苦,虎啸一何怒。”

1901年,宋恕前往浙江杭州求是书院担任汉文总教习,介绍西学,传播新思想,书院许多学生因受他的影响和启发,而倾向于进步和改革。自戊戌之后,宋恕和章炳麟之间的分歧日益突出。早年,宋恕和章炳麟就因商鞅的历史评价和对张之洞的观感问题发生“大辩攻”,宋恕主张尊孔尊孟,章炳麟主张薄孔尊荀;宋恕切齿痛恨(商)鞅(李)斯,章炳麟极力为商鞅辩护。此后,宋恕仍坚持主张议会立宪,章炳麟转向排满革命。宋恕承认章炳麟是真正的爱国者,又不赞同章炳麟转向暴力革命之举,但为了章炳麟的安全,宋恕劝说章一月,“莫作稼轩词”。当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以康有为为首的君主立宪派通过论战逐渐区分开来之际,章炳麟一纸震动中外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站在时代前列,而宋恕则看不到新生的力量和新的方向,逐步停滞下来。

1903年,宋恕忧国伤时,东渡日本,探求救国真理。他前往日本东京,访问学术名流,在日本“觐风土,谘学术”,始终不渝地主张学习日本。次年,宋恕返国。

这一时期,宋恕的思想是非常矛盾的:他一方面反对排满反清,对留日学生的进步活动多有抵触,另一方面,宋恕又歌颂郑成功抗清,痛斥清初文字狱,赞扬全祖望所承传的浙东学派的优良传统。

1905年,应山东巡抚杨士骧之聘,宋恕担任山东学务处议员兼秘书,后曾代办山东编译局坐办兼编审,致力于推进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事业,提出一系列颇具价值的创议,对山东文化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做出历史贡献。因学务处总文案周拱藻把持学务处,又因杨士骧升署直隶总督离开山东,新任山东巡抚对他并无特别信任,加之身体状况不佳,

^① 《忘山庐日记》中,“师说”作“经说”,“久荒芜”作“信非诬”,“表”作“海”,“孤忠赋”作“斯人咏”,“扶桑”二字空缺。

故宋恕屡辞议员职，并于1909年辞差，返回浙江平阳故乡，坚持学习日本语语法，尝试改革中国文字和语音。1910年，宋恕病故，终年四十九岁。

宋恕的出身和生平事迹虽无显赫惊人之处，但其思想和学术却有很多独具特色之处。在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深入人心，尤其是理学仍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和社会伦理规范之际，唯心论统治着哲学界的时候，宋恕却自称“弱冠以后，极端主张唯物论”，并宣称要与康有为、谭嗣同等的“惟心论”划清界限，为此，宋恕倡议创设神州哲学会。应当这样说，宋恕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遗产有合乎科学的批判继承态度，守正不守旧，求是求新而又不刻意求新，他曾替中国思想史上被打入异流的王充、王通、柳宗元、王安石、戴震等许多卓越的思想家翻案，如称赞王充是“盖周后明前一人而已”，是我国近代表彰王充唯物论思想的第一人。他多次表彰黄宗羲、顾炎武、颜元、王夫之、唐甄、包世臣、冯桂芬、郭嵩焘等明清进步思想家，坚定地贬斥董仲舒、韩愈、程颐、朱熹、李光地、曾国藩等维护程朱理学的思想控制、社会束缚，痛贬他们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言行。

宋恕一生著述不辍，为了彰显其唯物论思想，他要续《论衡》，要著《经通》和《子通》，要续《史通》和《文心雕龙》，甚至敢于“嗣素王”。在维新变法思想上，宋恕敢于公然提出“易服更制，一切从西”，在主张学习西方的态度上，宋恕的表现是很为激烈的。他提出崇儒抑法理论，附会原始儒家、孔孟思想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实质上就是要发扬民主传统、反对专制统治。宋恕痛斥理学“率土地食人肉”，在维护被压迫妇女和少数民族利益方面，表现出一种真诚的态度，在抨击专制制度的思想基础、思想支柱的激烈程度上，在我国近代思想家中也是罕见的。宋恕在文学思想上，主张情与实，揭斥桐城派的“不情”实质；在教育思想上，宋恕主张间接教育和直接教育并重，主张“政为教之母”，反对“教为政之母”，都是比较特出的思想主张。其师俞樾称誉他有“绝后空前之识”，李鸿章惊异于他的“海内奇才”，孙宝瑄赞他为“旷世之大儒”，蔡元培肯定他有“哲学家的资格”，许寿裳断定他为“实一伟大革命学者”，虽然不免有过誉之处，但决非偶然。然而，宋恕这位在戊戌变法时期很有影响、十分值得重视的进步思想家，却一度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思想史上没有他的位置。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宋恕长期以来竟然被人遗忘了呢？当然是